airiti

漢學研究集刊第三十九期
2024 年 12 月　頁 35-80

宋朝書院盛行的原因及其與官方的互動關係研究

林葉連*

摘　要

「書院」之名起於唐朝，由藏書處所轉而成為招生授課的地點。本篇首先探討宋朝書院大興的原因。然後探究宋朝書院與官方的種種互動關係。書院屢獲朝廷的賞賜，包含土地、書籍、匾額，甚至是封賞官職。書院的私立或公立屬性，存有變更的可能；這充分顯示民間辦學與官方擢材之間，關係密切，雙方各取所需，互蒙其利。

著名儒者、理學家是書院教學及思想的主要領航者，他們為書院建立學規，也將儒家思想的精華藉由書院教育發揚開來，除了鼓勵學子參加科舉考試之外，更強調學子不忘義利之辨，必須有志於修身養性。凡此努力，對於提升國民素質，推廣道德教育，淳化社會風俗，都有莫大的助益。因此，民間書院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為官方默默地做了很大的貢獻。

在學風自由的背景下，書院的經營呈現「朝廷關聯式」、「家族文化式」、「地域文化式」等不同模式分頭發展。但由於許多理學大師皆擔任官職，以致三種模式的書院皆與朝廷科舉有著緊密的關連。然而，畢竟書院採行自由開放的學制，具有教學和研究相結合的功能，加上名師薈萃，重視文化交流，使書院變成綜合的教育研究組織和學術中心。大致上，書院此一特殊成就往往是僵化而狹窄的官學所無可比擬的；這是宋朝書院為學術界拓展出來的新天地，堪稱卓越的貢獻。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

關鍵字

書院　理學　宋朝教育

2024 年 6 月 11 日來稿　2024 年 8 月 30 日接受刊登

airiti

The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officialdom

Lin Yeh-Lien

Abstract

The name "Academy" originat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an institution for collecting books, but later evolved into a place for admitting students to attend classes.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flourishing of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n explore the variou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cademi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official court. Academies often receive rewards from the court, including land, books, plaques, and even official positions awarded to certain academy operators.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change in the private or public nature of academies; This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education and official admission officials, with each party taking their own needs and benefiting each other.

The famous Confucians and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academy's teaching and thought. They established academic rules for the academy, and also carried forward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the academy's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encouraging

airiti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y also emphasized that students should not forge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and must be motivated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integrity. All these efforts are of great help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and purifying social customs. Therefore, folk academies have silent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offici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a free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management of academies ha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modes, such as "court related", "family cultural", and "regional cultural color". However, due to many masters of Neo Confucianism holding official positions, all three models of academ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owever, after all, these academies adopt a free and open academic system, with a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functions. Coupled with the gathering of renowned teachers and the emphasis on cultural exchange, these factors have made the academies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academic cent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bove-mentioned special achievements of academies are often incomparable to rigid and narrow official schools; This is the Xintiandi that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expanded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it can be called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Keywords: academies, Neo Confucianism, Song Dynasty educa

airiti

宋朝書院盛行的原因及其與官方的互動關係研究

林葉連

壹、前言

漢朝已有私人創辦精舍、精廬，有大師駐講，四方學子也聞風而至；但是，這與宋朝書院的運作方式仍然有所不同。東漢和帝期間，蔡倫發明蔡侯紙，初唐發明雕版印刷術，以致中唐之後的書院趨於定型和永續發展，此為漢朝所不具備的教育形式。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開元（713－741）年間，可是，當時「麗正」、「集賢」等書院的性質，只不過是政府設置的圖書館或編校書籍的處所，而不是聚徒開課講學的地方[1]。而唐玄宗至昭宗年間，陳氏家族在江西江州所建家塾，逐步發展成東佳書院，成為招收學生以及講授課業的學校，後來宋朝大量興起的書院幾乎和它沒兩樣。關於這種「書院」的本質，李才棟說：

> 這個實質應是起始於私人或公眾創建，藏書與教學結合，並高於蒙學等等，而不光是大師講學問題。[2]

因此，常態而固定的機構，具備藏書，從事教學，且地位高於蒙學，這樣的運作模式正是本篇所要探討的宋朝書院。

宋朝之官學，有所謂京師四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宗學；此外，尚有小學、廣文館、諸王宮學、內小學等。中央官學以太學為最盛，太學生於兩宋學術、政治上，皆占一定的重要地位。地方學校則有府、州、軍、監、縣各立之學校，宋初不甚完備，仁宗時始大興地方之學。南宋中葉以後，地

---

[1]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上》（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頁 200。

[2] 李才棟：〈書院的起源與宋代書院的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5 年第 3 期，頁 86。

airiti

方學校漸衰[3]。而宋朝最負盛名的教育場所，則是與上述官學不太一樣的、名為書院的機構。

書院的發展，除了與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它又與官學、私塾、科舉制度和文化學術思想的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結。茲以宋朝書院為範圍，探討當時書院興起的原因，及其與官方之間多面向的互動關係。

一、宋朝書院興盛的原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

> 宋興之初，……（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四書院之名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4]

宋朝初年，公立的州縣之學成效不彰，辦辦又停停，只流於形式。真正有心辦學，而且做出具體成績的，則是書院；北宋甚至造就了所謂「四大書院」。至於宋朝書院之所以興起，大致上有兩大原因：

（一）、戰亂時期，給予學子求學的機會和空間

> 唐天寶十四年（755 年），安祿山於范陽（北平）起兵造反，至寶應二年（763 年），安史之亂結束，吐蕃大掠而去，長安為之一空。此後，唐朝面臨藩鎮割據難以收拾的困境，兵鎮幾乎遍及全國。唐憲宗曾有效地加以壓制；憲宗死後，盧龍、成德、魏博三鎮又亂，唐室從此無法收復。此外，又有回紇的漁利、吐蕃的寇侵，南詔的叛變。朝中則有宦官之亂和黨爭。及至唐懿宗、僖宗時代，遭遇寇亂

[3] 傅樂成主編：《中國通史》，王明蓀著：《宋遼金元史》（眾文出版：75 年），頁 121。

[4]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611，頁 120。

airiti

以及藩鎮交兵，終於導致中央政府的解體。[5]

關於五代時期的君主更替，《中國通史》如是記載：

在五代十三君中，不得其死者八人，其中唐明宗以李從榮攻宮門，受驚而死；晉出帝石重貴於國亡後忍辱偷生十八年，寂寞地死在契丹。其餘六人，四人被殺，二人自殺。以改朝換代弒君戕主為兒戲的時代，君臣猜忌，爾詐我虞，日以殺伐為事，又何能顧到國計民生。[6]

總之，自唐中葉、五代以後，國家長期陷於分裂割據狀態，各地節度史擁兵自重，戰爭不斷，官學衰落，以致學子求學無門。宋朝始建，朝廷急於選拔人才以解決迫切的時用，以致教育延宕八十餘年，官學無法達到應有的發展，一般學子求學無門。書院值此教育界的空窗期，遂展現培育人才的強大生命力，發展成重要的私立教育機構。此即呂祖謙所言：

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7]

因此，北宋初期書院興起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滿足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願望。

（二）、糾正宋初重選而不重教的現象

宋朝初年，書院興起的另一個原因，是緩解朝廷尚文治而疏於培植根本的弊病。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 年），范仲淹〈奏上時務書〉如下：

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

[5] 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1993 年），頁 419 至 451。又程光裕、王吉林：《中國通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4 年），頁 187 至 198。

[6] 程光裕、王吉林：《中國通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4 年），頁 199。

[7] （宋）呂祖謙：《呂東萊先生文集》（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1970 年），卷 6，頁 10。

airiti

> 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8]

范仲淹鑑於古代明君懂得「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文、質相救，求其平衡，這個重責大任落在執政者身上。至於「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的時代任務，寄望於教育工作的推行。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 年），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也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9]

仁宗慶曆四年（1044 年）范仲淹極力批評當時不重教而重選之政策，主張廣設學校。凡應科舉者，須先接受學校教育。《宋史．卷 314．范仲淹傳》：

>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10]

這裡所謂「上十事」，是指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第三條「精貢舉」，內容如下：

> 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

---

8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收錄於《宋集珍本叢刊》冊 3（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頁 14。

9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收錄於《宋集珍本叢刊》冊 3（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頁 36。

10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13，頁 10273。

airiti

> 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11]

《宋史紀事本末．卷 38．學校科舉之制》:

> 仁宗慶曆四年……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1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到周朝授人卿大夫之職，必先施以教育，三年之後，考驗他們的德行道藝，這是為國舉才的重要措施。他認為宋初學校衰落的重大原因，是當時執政者的觀念是重科舉而輕學校，當時學校中如有明師，尚可教人治國治人之道，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國家以辭賦取進士，可謂捨大方而趨小道，以致有才有識者達不到十分之一二。所以范仲淹建議廣設學校，傳授經學，使人明於理道，而浮薄者方能知所勸勉。

《宋史．卷 157．志第 110．選舉 3》記載（仁宗）慶曆四年：

> 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

[11]（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卷上，冊 40，頁 178。

[12]（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收錄於中華書局編輯部：《歷代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冊 2，頁 1363。

airiti

> 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
> 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役然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致千餘。就試試已，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但為遊寓之所，殊無肄習之法。居常聽講者，一二十人爾。」[13]

北宋的地方學校有府、州、軍、監、縣各立之學校，宋初不甚完備，仁宗時始大興地方之學。仁宗下令於地方設置學校，詔「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中央也積極擴充學生員額。但是即使宋仁宗有意改革舉才方面的弊端，下詔州縣皆需設立學校，而天章閣侍講王洙還是進言，說國子監學生只專意於科考，考完即散歸，學子只是到此一遊而已，留下來學習課業的學生寥寥無幾。這充分說明官學的辦學並未落實，成效不彰，無怪乎書院逐漸興起，其聲勢足以凌駕於官學之上。

南宋朱熹曾批評北宋初年官學不振的情況，說：

>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14]

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也批評宋朝官辦學校的種種缺失：

> 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跡之蕪廢而已也。……。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

[13]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5，頁 3658。

[14]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3，卷 79，頁 1444。

airiti

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15]

北宋官學既然表現不佳，足以使人急功近利，甚至忘義，而某些好古圖舊的熱心賢士，遂慨然發憤創立書院。而書院的辦學績效，相形之下，顯然比官學優越許多。此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言：「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16]《續文獻通考》也說：「宋自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後，日增月益。書院之建，所在有之。」據學者針對今江西省範圍內書院發展情況所作研究為例，北宋新建書院 40 所左右，其中建於慶曆以後的，占五分之三。[17]可見教育從此受到普遍的重視。

二、宋朝書院與官方的互動關係

有關宋朝的書院發展，李才棟將北宋分為 2 個階段，將南宋分為 3 個階段[18]，略述如下：

北宋書院的二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自建隆元年至慶曆興學（960－1043 年）。這時學者聚徒講學於學院，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此時的鄉校，惟兗、穎二州有之，餘無聞矣。

第二階段自慶曆四年始至靖康元年（1044－1126 年）。這時由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幾次興學，無論東、西兩京的國子監，還是各府、州、軍、監，以至縣城的地方官學都有所擴展和建置，形成了書院與官學並存的局面。據元朝馬端臨之說：衡陽石鼓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19]。

南宋書院的三個階段：

---

15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3，卷 79，頁 1444。

16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611，頁 120。

17 李才棟：〈唐至北宋的江西書院〉，《江西教育學院學刊》，1982 年第 2 期。

18 李才棟：〈書院的起源與宋代書院的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5 年第 3 期，頁 85 至 88。

19 （宋）呂祖謙所主張的四大書院，則以嵩陽書院取代石鼓書院。

airiti

第一個階段，可以高宗即位，建炎元年（1127 年）起，至紹興末年（1162 年）。這時書院講學的帶頭人是楊時，其學被譽為程氏正宗。楊時及其同道、弟子們反對北宋王安石所倡的「新學」，提倡理學。宋高宗為了建立和鞏固他的集權統治，加強思想控制，因此，既禁王學，也禁程學；因此使得許多程學的追隨者在朝堂中遭到排擠，迫使其中一些人只得退縮到書院的講壇來表達己見。

第二階段可自孝宗隆興元年（1163 年）開始，至寧宗開禧三年（1207 年）。這時學禁稍懈，許多學者自創學派，各立書院，聚徒講學。他們各抒己見、互相切磋。其中以朱熹最具影響力。朱熹興復了白鹿洞書院，在此前後還建立了雲谷、寒泉、武夷、滄州等書院和精舍，還在很多書院講學。此外，張拭主持潭州嶽麓書院，呂祖謙創辦金華麗澤書院、陸九淵主講於貴溪象山精舍。這些書院可稱當時書院教學活動的佼佼者。這一階段，南方書院很不少，僅就江西而言，始建書院五十餘所，尚不包括白鹿洞書院在內。不過寧宗時由於「慶元黨案」的影響，理學家以及他們的書院一度受到壓抑。

第三階段自寧宗嘉定元年（1208 年）開始。這時史稱「嘉定更化」。理學的地位由屢遭貶斥一變為備受推崇。理學家紛紛進入朝堂，高官厚祿。書院的發展也達到宋代三百年的最高峰。淳祐元年（1241 年），宋理宗趙昀曾給許多書院題字、賜額，後來又給許多書院山長授以官職。先是由州學教授或添差州學教授兼任書院山長（府、軍、監同），以後又給書院山長以「州學教授並視」的地位，進而以庶官兼任山長，最後又有祠官兼任書院山長的。

以下擬將北宋、南宋時期的書院做一綜合觀察，以探究此時的書院究竟與官方之間，有著怎樣的互動關係：

（一）、公立與私立屬性的更改

中唐以後，西元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已有民間人士建立書院且從事教學活動，就東佳書堂為例，即可說明書院的教學活動於起唐代。以下綜合各書院相關網站以及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的資訊，簡述北宋四大書院的成立和發展沿革及其公、私立屬性的變更情況如下：

1、白鹿洞書院：（在江西九江廬山。又稱：白鹿洞書堂、白鹿書院、朱

airiti

晦翁書院）

白鹿洞在唐貞元元年（785 年）時原為詩人李渤、李涉兄弟隱居讀書的地方，李渤當時養一隻白鹿自娛，甚馴，時人稱渤為「白鹿先生」。後來他出任江州刺史，於此修樓建亭，取名白鹿洞。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昇元四年（940 年），朝廷在李渤隱居的地方建立學館，稱「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置田藏書，由金陵國子監九經教授李善道主持學務，四方學子慕名而來，與京師國子監齊名。西元 976 年，南唐滅亡，廬山國學成為廢墟。

宋初，九江人在廢墟上建起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宋太宗趙匡義下令將國子監刻印的《九經》等書賜予白鹿洞書院，書院旋即知名度大增，學生有近百人，該時期已被奉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他勘察白鹿洞書院廢址後，其〈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寫道：「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南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20]，朱熹呈報禮部的〈申修白鹿洞書院狀〉[21]和給丞相的報告中申述興復書院的理由。淳熙七年（1180 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初步修復，這時書院只有學生十餘人。為興復白鹿洞書院，朱熹訂下學規，置田建屋，向各地發文徵求圖書，把《四書》、《五經》納入教學課程。

由此可知，白鹿洞書院的前身「白鹿洞」在唐朝只是文人隱居之處，五代十國時期，發展成南唐朝廷整頓的書院，後來一度荒廢。宋太祖曾下令整頓，這也是朝廷介入其事。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在官職任內勘察白鹿洞書院廢址，次年得到初步修復，隨後盛名再起。這是一個由私人住所發展成官方學校的過程。

---

[20]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2，卷 16，頁 240。

[21]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2，卷 20，頁 306。

airiti

2、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

唐末五代僧人智璿等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類」的學舍。北宋太祖開寶九年（976 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辦學的遺址上，「因襲增拓」，由官府捐資興建而誕生了嶽麓書院。北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嶽麓書院進入了北宋的鼎盛時期。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宋真宗親自召見山長周式，嘉許其辦學績效，親書「嶽麓書院」匾額，書院之名始遠播於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成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

北宋轉為南宋之際，嶽麓書院遭戰火洗劫，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 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延聘理學家張栻主教嶽麓，培養不少傳道經世濟民的優秀人才，強化嶽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乾道三年（1167 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時人形容「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由此可知，嶽麓書院的來源是：由佛寺所建原本供給居家修行之士使用的「學舍」，北宋時被改建為半官半私屬性的書院。

3、應天府書院：（在河南商丘。又稱：商丘書院、睢陽書院、南都學舍、南京應天書院、南京書院、南京國子監。）

應天府書院，原址位於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南湖畔，由五代後晉時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今商丘市睢陽區）通儒楊慤創辦南都學舍。楊慤去世後，他的學生楚丘人（今山東曹縣）戚同文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聚眾講學，稱「睢陽學舍」，繼承師業，繼續辦學。

宋初，睢陽學舍設於繁華鬧市，與其它設置於幽靜山林的書院不同。北宋立國初期，求才孔急，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後，學校一度關閉。

景德三年（1006 年），宋真宗將太祖發跡之處宋州升為應天府；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

airiti

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助教。」由此可知，當地人曹誠在戚同文舊居建了學校，申請納入官學，經由應天府知府上報朝廷，受到宋真宗讚賞，令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院，以曹誠為助教，正式納入官學。[22]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范仲淹年十三，在獲知姓「范」不姓「朱」之後，決意自立門戶，苦讀於此。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宋真宗將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仁宗天聖年間，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學教席，培育許多優秀學子，為北宋教育做了重大的貢獻。仁宗景祐二年（1035 年），書院改為應天府學，給田十頃。慶曆三年（1043 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今開封）、西京（今洛陽）的國子監並列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將私立書院捐贈給官方且升級官化為國子監的書院。

靖康之變時（1126 年），金兵南侵，中原淪陷，應天府書院被毀，學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南移，應天府書院隨之沒落。

4、石鼓書院：（在湖南衡陽。原名李寬中秀才書院。）

石鼓書院，位於湖南衡陽市城北蒸、湘、耒三水匯聚的石鼓山上，是湖湘文化重要發源地之一，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脈」之譽。

石鼓書院始建於唐憲宗元和五年（810 年），邑秀才李寬在衡陽石鼓山上合江亭旁建房讀書，取名為「尋真觀」，刺史呂溫曾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一詩記其事。

宋代太平興國二年（978 年），宋太宗趙匡義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宋至道三年（997 年），李寬族裔李士真據其故事重修書院、廣招弟子，石鼓書院至此成為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 年），衡州知府劉沆上奏石鼓書院事，宋仁宗閱後賜額「石鼓書院」，且賜學田，改為州學。由於兩度被皇帝賜額，石鼓書院步入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四大書院。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 年），石鼓書院改為衡州路學府，屬於官學。許多名流至此講學；如蘇軾、周敦頤等。

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 年），部使者潘疇擴建石鼓書院，榜以鼓額

[22]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1，頁 120。

airiti

曰「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之印書藏其中。淳熙十四年（1187 年），理學大師朱熹、張栻來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張栻在合江亭中立碑，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當時戴溪擔任山長，刊行《論語》相關著作。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 年），林畊以州學教授兼山長，刊行《尚書全解》，對經學的整理做出貢獻。

由此可知，石鼓書院原本為私人之尋真觀，後改建為書院，升格為州學。

以上書院之私立、公立屬性的轉移，顯示朝廷非常肯定書院為國育才的強大功能；並且，從朝廷將現有卓具規模的私立書院一轉成為半官半民，或公立書院的現象，可見朝廷施用了十分簡易的方法，就直接獲取了可觀的辦學成果。

（二）、書院屢獲朝廷或官方賞賜

1、賞土地學田：

例如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李煜就曾割善田數十頃，作白鹿洞書院學田。北宋仁宗也曾賜給部分學田，白鹿洞書院將學田租給附近農民耕種，歲收租廩充為養費。南宋書院經費多為自我籌措，來源為私人捐助，或經官方允准，撥歸寺觀絕產和閑地，充為經費[23]。宋代太平興國二年（978 年），宋太宗趙匡義賜學田給石鼓書院。[24]

除了朝廷賞賜之外，另有私人全部自備土地、經費完全自籌的情況，例如南宋浙東一帶頗為富庶，巨商甚多，屢有出資贊助書院者。東陽（今浙江金華）郭氏累代出資創辦書院，家撥良田數百用以贍士，子孫諸代先後創立了石洞書院、西園書院和南湖書院。浙東的杜洲六先生書院，據全祖望〈杜洲六先生書院記〉記載：設有先聖碑亭、禮殿、講堂、養士六齋、慈湖祠、書庫、門廊庖福（浴室），並有田租資養學者。維持這樣規模較大的書院，

[23] 喬衛平：《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8。

[24]（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1，頁 120。

airiti

顯然需要雄厚的財力和田租。[25]

德安義門陳氏能聚族同居 230 餘年，就是因為有獨一無二的〈陳氏家法三十三條〉。東佳書堂在有「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的同時還擁有學田二十頃。陳氏家族設定學田作為書院的固定收入，保證了書院聚徒、聘任、教學、購書、藏書等各項事業的穩定發展。據文德翼《求是堂集》載，至宋初，陳氏「所藏帖與書，號為天下第一」，東佳書堂發展為鼎峙江東的三書院之一，如果沒有家族的經濟資助是很難做到的。東佳書院設學田以確保辦學經費的方法被後世廣泛繼承，開創了中國古代書院設學田的先例。另外，東佳書院突破了一般家塾較為封閉的性質，招收外姓子弟，實行開放辦學。[26]

程運先生歸納宋代書院經費來源，分為六類，多見官方以學田支助民間書院的事例：(1)、由官府買給學田，以充經費。(2)、由官府指撥官田以養士。(3)、撥廢寺田或絕戶產以充經費。(4)、由公帑撥充或由地方教育經費勻支。(5)、以公款為母金，生息而用其子錢。(6)、由地方官或私人捐撥。[27]

2、賞書籍：

例如白鹿洞書院，宋太祖趙匡胤下令將國子監刻印的《九經》[28]等書賜予書院。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知江州周述上書朝廷，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以供生徒肄習，詔從其請，驛送國子監印本《九經》至書院。[29]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知南康軍，重新整頓白鹿洞書院，八年（1181 年），又獲得朝廷所賜國子監經書，聲望更加崇隆。

再如嶽麓書院，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湘陰人周式主持書院，擔任

---

[25] 喬衛平：《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8。

[26] 中文百科：東佳書院，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s://reurl.cc/adEAKG。

[27] 程運：〈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政大學報》21 期，頁 104 至 106。

[28] 據《五代會要》，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 年），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此為雕板經書之始；後漢、後周繼其事，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953 年)，九經皆成。此項工作係由國子監任之，故所刻本名曰「監本」；所刻內容係據唐石經刻經文，又附以經注本之注文。

[29]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冊 2，頁 1339。

airiti

嶽麓書院首任山長，上書朝廷，請賜諸經釋文義疏，以及《史記》、《玉篇》、《唐韻》等書，此為首次獲得朝廷的賜書。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宋真宗賜給山長周式中秘書（宮中藏書）。[30]

又如應天府書院，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二月，賜予英州文宣王廟版《九經》。[31]

朝廷所提供的經典版本，對於書院而言，實有重大的意義，從此可提供師生善用更佳的教材，無論做為吸收知識，或是培育學生參與朝廷所舉行的科舉考試，都是極為重要的寶藏。

3、賜匾額：

例如宋朝太平興國二年（978 年），宋太宗趙匡義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至道三年（997 年）五月，宋太宗賜額「太室書院」（即嵩陽書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宋真宗頒書賜額「應天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真宗親書「嶽麓書院」匾額褒揚之。南宋淳佑十年（1246 年），理宗賜「嶽麓書院」匾額。北宋景佑三年（1035 年），宋仁宗欽賜「石鼓書院」匾額。

宋朝大小書院何其多，無論私立或官立書院，只要能獲得皇帝賜予匾額，都足以大大提升書院的地位，對國內書院的排名和招生率等方面，必能起到不小的助力。

4、封賞職位：

例 1，嶽麓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真宗接見周式，任命他為國子監主簿，仍歸嶽麓書院教授[32]。例 2，應天府書院，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命戚同文之孫奉禮郎戚舜賓主持院務，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當地建校者曹誠擔任府助教。[33]應天府的辦學模式，令當地書院風氣大盛。例 3，李覯

[3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冊 2，頁 1339。

[31]（清）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80。

[3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冊 2，頁 1339。

[33]（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考・7》（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冊 2，頁 1339。

airiti

先在南城五里的赤溪風月亭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千人之多。仁宗皇祐二年（1050 年），因范仲淹、余靖推薦於朝，授李覯將仕郎，試太學助教。仁宗嘉佑四年（1059 年），權同管勾太學[34]。例 4，北宋杜子野，江西宜黃中港人，平生致力辦學，創有鹿崗書院，少年王安石受學於此。[35]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朝廷授予杜子野「特奏名」進士。

上述封賞相關人士職位的情況，使用在獎勵某人辦學有卓著成效時，或朝廷將私立書院變成半私半官的屬性，或是將它由私立納為完全國營書院屬性的時候。

（三）、書院學規皆本於儒家思想，影響教化極深

學規、學則由來甚古，先秦《禮記》中所載尊師求學的禮儀，〈弟子職〉一篇詳述弟子事師、受業、饌饋、灑掃和進退之禮，可以視為中國最古老的一篇學規。唐朝開元年間的《唐六典》記載諸多有關學令，入學資格、學校禮儀、專業教學、成績考核、違規懲罰、休假制度等條例，顯示學校管理的條文化，而儒家思想往往以精神指導之姿，被化入相關條文當中。

唐朝書院有學規，如唐昭宗大順元年（890 年）陳崇在山西德安縣東佳山創立「東佳書堂」（後擴建更名為東佳書院），當時即已寫下〈義門家法三十三條〉，其中規定：

> 「立書屋一所於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擇吉日起館，至冬日解散。童子軍七歲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逐年於書堂內次第抽二人歸訓，一人為先生，一人為副。其筆墨硯並出宅庫，管事收買應付。」
>
> 「立書堂一所於東佳莊。弟侄子姓有賦性聰敏者令修學，稍有學成者應舉。除現置書籍外須令添置。於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

[34] 管勾，管理也。

[35] 後人賦詩懷念，長沙熊少牧有「子野才堪介甫師，鹿岡書院鹿岡陲」之句；明黃濯纓為詩曰：「落日荒村處士莊，至今井畔是方壙。喬林幾許迎新主，還有遊人說鹿岡。」宋神宗寧熙之後，鹿岡書院即荒廢無聞。

airiti

令照管，不得遺失。」

義門陳氏宗譜中〈推廣家法〉規定：

「男司耕讀，女司紡織。」

「子孫於蒙養時先當擇師。稍長，令從名師習聖賢書，教給禮義。不可讀雜字及刁滑詞訟之事，以乖行誼心術；亦不可學誣罔淫邪之說。如果資性剛敏，人物清醇者，嚴教舉業，期正道以取青紫。中人以下亦教之知理明義，使期去其兇狠驕惰之習，以承家教。又當教之以忠厚而儉樸，因之庶免習為輕浮以入敗類。」

義門陳氏辦教育的基本思想是要子孫普遍受教育，施教程度因人而異，不成才則成人，非得「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而不可。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徐鍇〈陳氏書堂記〉:「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又說:「陳衮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遊學之資，……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名立者蓋有之。」像進士章谷、夏竦即是東佳書堂學生，可見，陳氏辦教育影響之大。至於宋朝書院的學規，大略舉述其顯例如下：

1、范仲淹為應天書院建立學程

北宋初年，胡瑗、孫復、石介、歐陽修、范仲淹等人，有自覺地肩負重建傳統中華文化、復興聖賢學說的使命，遙接三代之「道」，求「生民建教之本」，以及「救斯文之薄」，打算將儒家文化精神重新貫注到政治、社會、學術、人心之中；「創通經義」、「革新政令」，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

天聖五年（1027年），范仲淹為母守喪，居應天府寧陵縣。時任南京留守、知應天府晏殊聽聞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請他到府學任職，執掌應天書院教席[36]。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睢陽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一系列課程和管理規則，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

[36]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

airiti

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6 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范仲淹平日勤勉督學、以身作則、創導時事政論，每當談論天下大事，輒義正辭嚴、慷慨陳詞。當時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可謂來自范仲淹的倡導，樹立了煥然一新的學風。其〈南京書院題名記〉[37]：

> 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玄有人焉。[38]

此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

2、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訂學規

南宋朱熹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教務時，曾為白鹿洞書院制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學規〉)，以及〈白鹿洞書院教條〉。這是中國書院發展史上一個綱領性學規，對於當時及後來的教育界產生莫大影響。〈白鹿洞書院揭示〉如下：

>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
>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
>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

[37] 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的陪都，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

[38]（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冊 40，頁 56。

airiti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

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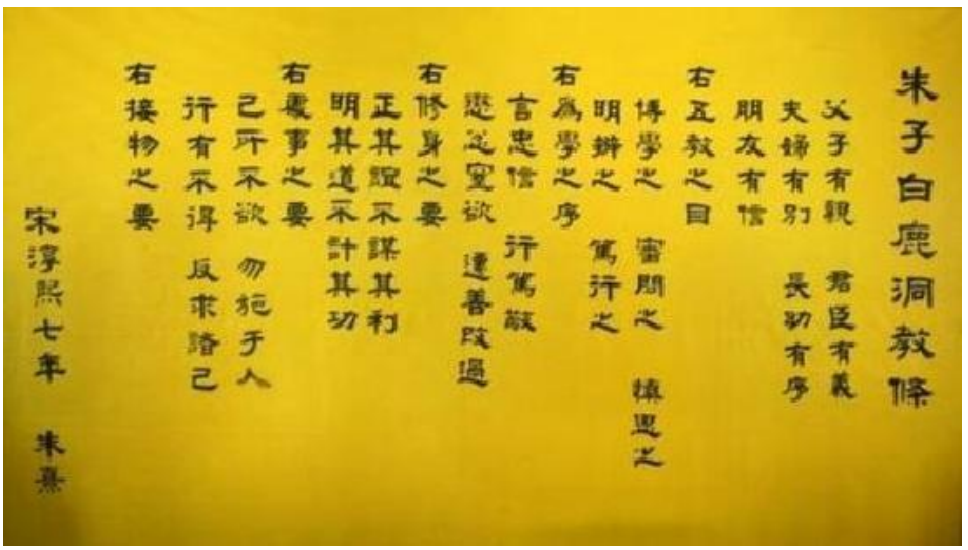
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39]

[39]（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

airiti

〈白鹿洞書院教條〉，內容如下[40]：



這是簡單扼要的綱領式列舉，除去相關的說明文字，當中強調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五倫相處之道，要求學生敬敷上述這五倫之教；其次是明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為學次第；再次則是教導學生修身、處事、接物的要領。對於學子而言，此篇教條可謂簡單明瞭，易於記誦和實踐。朱子已然規定了書院教育的宗旨、內容和方式，條列具體而涵意精微，成為其後歷代書院制度模擬的範本。

3、朱熹為嶽麓書院頒布教條

朱熹也有與上項相類的「書院教條」，那是在紹熙五年（1194 年），在距離嶽麓會講 27 年之後[41]，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次來到潭州，重整嶽麓書院，頒行〈朱子書院教條〉。經過他的整治，嶽麓書院再次進入繁盛時期。

4、朱嘉為石鼓書院作記

石鼓書院方面，宋度宗咸淳 10 年（1274 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駐衡州時，作詩〈合江亭〉:「天上名鶉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曲，合水兩三洲。……」；淳熙十二年（1185 年），部使者潘田青（一作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3，卷 74，頁 1366。

[40] Tripadvisor 貓途鷹：白鹿洞書院教條，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s://reurl.cc/1blqNp

[41]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 年），朱熹造訪嶽麓書院，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

airiti

疇）就原址建屋數間，榜以鼓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繼成，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請朱嘉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

（四）、朱熹促進書院發展，為南宋理學領航人

南宋高宗南渡之後，設置國子監和太學，地方州縣學校也相繼恢復和設立。然而，由於重科舉而輕學校，一般庠序（學校）無益於科舉功利，故教育呈衰落現象。《宋史．卷 157．志 110．選舉 3》：

> 中興以來，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42]

南宋初年，如國子監、太學，以及地方州縣學校都得到設立，雖然都是政府所設立，但學子心中在意的，是科舉功名，無心進修，以致學校淪為有名無實的機構。考生將學校看成驛站裡供人休息的房舍，只把教師看成路人一般。

上述情況，到了朱熹而獲得改變。淳熙六年（1179 年）三月，朱熹知南康軍，當時白鹿洞書院已廢馳百餘年，他呈報〈申修白鹿洞書院狀〉[43]給尚書禮部，請求修復白鹿洞書院，次年，書院獲得修復，朱熹自任洞主，親自掌教，發文各地徵求圖書，並於淳熙八年（1181 年）上書朝廷，請賜御書石經和監本《九經注疏》、《論語》、《孟子》等書；設法籌措置田基金等。這是南宋書院大興的起點。

南宋的書院教育普遍風行，至於理宗朝（1205－1264）書院發展到極盛。獲得理宗賜院額，或賜御書的書院計有 18 所，這與寧宗嘉定年間至理宗景定年間，歷時半世紀，崇尚程朱理學的政策直接相關，是南宋書院創辦數量

---

[42]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5，頁 3671。

[43]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冊 52，卷 20，頁 306。

airiti

最多、規模最盛的時期。理宗為了表達對書院的支持，除了積極為書院頒書賜額，往往也委任山長以及學官，用以振興書院。[44]這期間，偽學黨禁漸弛，致使理學最終被奉為正宗的官方哲學而統治了宋代教育領域。[45]此外，據《續文獻通考．學校考．書院》的統計，南宋初創的書院約為 164 家，主要集中在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地。其中，江蘇、安徽一帶約為 19 所，浙江一帶，約為 23 所， 江西一帶，約為 39 所，湖廣一帶，約為 23 所，四川一帶，約為 13 所，福建一帶，約為 33 所，廣東一帶，約 8 所，廣西書院，約 6 所。[46]

（五）、理學使書院教育臻於極盛，時代思想大放異彩

宋初，胡瑗、孫復、歐陽修、范仲淹等儒家學者們心所繫念的政治理想，經過近百年的醞釀，終於產生了令人耳目一新、融合儒、釋、道思想的儒學，名為「理學」，並且迅速成為時代的思想主流。

理學興起於北宋，著名的理學家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人，他們在致力理學研究與傳授之時，大多未直接參與書院的機制。

北宋仁宗嘉祐治平年間（1056 年－1067 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理學家以邵雍（康節）、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為大宗，被譽為「北宋五子」，他們大致上承繼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二年（1069 年），宋神宗任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進行變法，次年引發黨爭，二程因此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北宋兼談性理而著名者，計有四派：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中學派、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洛學由朱熹（元晦、紫陽）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位居正統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在兩宋時期，人稱理學四派。

---

[44] 教育雲，教育大市集：許家銘：〈南宋書院的興盛與理學的發展〉，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4 日，網址：https://reurl.cc/2j7V24。

[45] 孫培青：《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66。

[46] 喬衛平：《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4。

airiti

南宋的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

放眼宋明學術，程朱理學是一大流派，有時被簡稱為理學，以便與陸象山（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相對。

書院在南宋的發展，可謂進入了另一個高峰階段。此時書院的盛行，和理學的發展密不可分。南宋（1127~1279）高宗初年，楊時、胡安國、胡宏等人將理學南傳，主要以書院教學的方式呈現。楊時曾於常州的毗陵書院、無錫的昆陵、東林書院講授理學。高宗紹興（1131~1162）初年，胡安國、胡宏父子在湖南衡山傳授理學時，創立了碧泉書院、文定書院。這是南宋時期，書院的初步發展。

及至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 年）、淳熙（1174－1189 年）年間，理學大盛，理學家們四處創建、主持書院，傳播個人學術思想。如朱熹（閩學）、陸九淵（心學）、陳亮（永康之學）、葉適（永嘉之學）、呂祖謙（婺學）、真德秀（西山真氏學）、魏了翁（蜀學）、胡宏（湖湘學之開創者）、張栻（湖湘學之集大成者）等著名理學家為代表人物。至於南宋的官學，雖有國家支助的經費，因為科舉制度腐敗，導致官學風氣墮落，辦學績效不振。而書院提倡高風亮節，不仰慕功名利祿，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梗精神，專業於學術，推崇修己至誠之道，與腐敗的官學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南宋時期，理學雖幾度得以在太學講習，可是，當時的理學家曾經屢遭朝中權貴排抑。茲以《宋史》所記載朱熹遭受排斥的情形始末，舉例如下：

> 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

airiti

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47]

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1196 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48]

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朱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49]

上述情形涉及到轟動一時的「偽學」案，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 年）侍講朱熹因彈劾韓侂胄「擅權害政」，被韓用「內批」免去侍講官職。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 年）二月，韓侂胄使諫官奏趙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於社稷，趙汝愚被貶至永州（今屬湖南），後死於貶所。趙汝愚被貶，朱熹、彭龜年等奏論韓侂胄事，寧宗亦加以貶逐。 韓侂胄當政，凡與他意見不合者都被稱為「道學之人」，後又斥道學為「偽學」，禁燬理學家的《語錄》一類書籍。科舉考試中，稍涉義理之學者，一律不予錄取。六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慶元三年（1197 年）寧宗下詔，訂立偽學逆黨籍，入籍者 59 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凡與他們有關係的人，也都不許

[47]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16，頁 12756 至 12758。
[48]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16，頁 12767。
[49]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冊 16，頁 12768。

airiti

擔任官職或參加科舉考試。

從寧宗慶元元年（1195 年）開始的禁偽學，至慶元 6 年（1200 年）前後歷時 6 年之久，才獲得終止，史稱「慶元黨禁」。遇此嚴厲的「黨禁」，理學在一夕之間竟成「偽學」，而遭到查禁和打壓，著名學者們紛紛沈潛起來，專意於書院教育，賣力宣講性理，爭鳴術，也順便指論朝政。

後來，南宋的書院教育逐步恢復，至於理宗朝（1205－1264）書院發展到極盛，已見前述，茲不贅。

（六）、書院或理學家與官場之關係十分密切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睢陽書院和應天府書院的前身）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睢陽學舍一時成了政府倚重的教育中心。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應天書院改稱為「南京書院」。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 年），范仲淹受邀執掌應天書院，寫了〈南京書院題名記〉：

> 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50]

說明了應天書院在 20 年之間所栽培學子，畢業之後，進可為卿大夫，退可擔任鄉先生。順利獲得科舉功名的，確實不在少數。

北宋張載以「橫渠四句」而特別聞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古清美評論道：

> 「為天地立心」這一句話雖是張載所說，但這句話可以代表他們（北宋理學家）共同的關懷和理想。當他們為中國文化重寫新頁時，他們不但關注政治國家的現實層面，更要超越此一層面，為萬千生民及後代子孫建立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生命哲學，讓天道的運行、宇宙的存在都是生生不已的至善之流，是剛健不息的實理大道。而這至

[50] 《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冊 40，頁 56。

airiti

> 善、這實理就是天的「心」，就是他們繼承往昔聖賢之學，而為天地建立的「心」！這種魄力和意志，就是北宋理學家從儒家道德精神的鎔鑄和洗鍊中迸發出來的。[51]

北宋書院鼎盛時，官學尚未設置完備，書院講學內容與科舉之業近乎相輔相成。北宋著名理學家們，雖然大多沒有正式運用「書院」為推展教育的資源[52]，然而，這些理學家往往擔任官職；這或許是因為理學家們的人生目標，大致上是贊同「橫渠四句」的原則而奮鬥不懈。在這種情況之下，理學家們在宣揚理學的時候，難免與朝廷官職之間形成難以切割之勢。以「北宋五子」為例，只有邵雍一生和官職比較沒有關聯，只在過世之後，獲得神宗贈予著作郎，哲宗給予謚號；其他理學大師幾乎都擔任官職，大略如下：

周敦頤（1017－1073 年）：歷任郴州縣令、郴州桂陽令、太子中舍，置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地方官職。而後升職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

張載（1020 年—1077 年）：嘉祐二年（1057 年），中進士，先後任祁州司法參軍、丹州雲巖縣令，後遷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等。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在弟張戩上書批評王安石而被貶官之後，辭職歸鄉。熙寧九年（1077 年），因李大防推薦，應召入京，同知太常禮院，遇疾西歸。

程顥（1032~1085）：為程頤之胞兄，其曾祖父、祖父、父親皆任官職，程顥受其父之政治思想影響尤深。程顥於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中進士，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神宗初，任御史。

程頤（1033 －1107 年）：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元年（1086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

進入南宋時期，書院因理學家的倡導，大多講求性理自得之學，注重學生道德倫理的自我訓練和涵養，而不刻意追求功名利祿。然而，南宋理學在很長一段時期占據了科舉和中央官學的主導地位，致使理學也未必能與科舉利祿之學截然分開，兩者往往依然是互相依存的關係。

以朱熹（1130 年—1200 年）為例，他在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 年），

---

[51] 古清美：《宋明理學概述》，（臺北市：臺灣書店，1996 年）頁 3。

[52] （宋）張載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因為意見不同而被貶官，辭職歸鄉，自創橫渠書院，屬於比較少見之例。

airiti

賜同進士出身，後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官拜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為宋寧宗講學。後因韓侂胄擁立寧宗而得以擅權，便將朱熹褫職出朝。慶元二年（1196 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以偽學欺人，攻訐其為「偽學魁首」，列有六大罪。朱熹以偽學罪被落職罷祠，回歸建陽講學著述。

其他南宋理學學者，除了胡宏以講學為務，力辭朝廷官職之外，如：陸九淵、陳亮、葉適、呂祖謙、真德秀、魏了翁、張栻等各派理學代表學者，都曾擔任官職。足見理學與朝廷官職體制之間實有難以切割的牽繫。

至於私立書院與官職之間的關係，例如東佳書院在唐朝開創了一代讀書新風，取得了顯著的教育成果，為朝廷培養了大批人才。唐宋時期，東佳書院培育出 18 位朝官（其中有 3 人擔任過宰相），29 個地方官，55 位進士，陳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進士」更是傳為美談。而且，書院重視人倫教化，通過對家族子弟宗法倫理意識的培養，形成了「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門」的良好家風，使德安陳氏成為古代封建家族的典範。因此，唐僖宗、南唐烈祖、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先後褒旌陳氏為「義門」。唐僖宗題詩：「九重天上書聲貴，千古人間義字香。」宋太宗題詩：「三千餘口文章第，五百年來孝義家。」書院因聲名遠播、山水佳秀、藏書豐富，還吸引了歐陽修、朱熹、呂端、錢若水、黃庭堅、楊億、蘇軾等文人學士前來求知、講學或遊覽，留下了 300 多件題詞文章和詩篇。據各地義門陳氏宗譜載：僅「宋慶曆四年（1044 年）計，應舉登科者四百有三。郎署之在朝者琛、遜而下十八人，當要路而居刺史、司馬、參軍、縣令者珪、儔而下二十九人」。名震朝野，蜚聲全國。[53]

就以上現象而言，陳雯怡的看法近乎實情：雖然書院蘊含道之尊嚴的「私學理想」，但並非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書院的真實面貌必須回到科舉與教育的關係來理解。宋時期的官學到書院，「選」到「養」，都跟科舉有關。[54]

---

[53] 中文百科：東佳書院，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網址：https://reurl.cc/adEAKG。

[54]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airiti

李兵提出兩宋書院發展面向的複雜度：自北宋初朝廷無力辦學，書院以「替代官學」之貌出現，其中乃是順應士人求學，書院因重新修復而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另有豐富藏書與名師巨儒之任教者，並提供跨地求學機會。至南宋，新儒學興，書院發展雖批評科舉取士，但並不等於反對科舉制度，形成德業與舉業並重之況。[55]

（七）、三種類型的書院皆與科舉考試有密切關係

宋朝書院可歸納為三類不同的屬性：朝廷關聯式、家族文化式、地域文化式等三種書院，分述如下：

1、朝廷關聯式的書院：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將「睢陽學舍」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五年後，應天府書院升格為「南京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曆三年（1043 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今開封）、西京（今洛陽）的國子監並列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從此，這所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

北宋時期，影響較大、數量較多的書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東京汴梁」（又稱汴京）的周圍和江西、湖南一帶。首都周圍的書院，如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官學色彩較濃，反映了這類書院在宋初興起，與朝廷的關聯較為濃厚。

應天府書院的辦學模式，與官方舉才有著密切的關係，使得當地書院風氣大盛。例如：李覯先在南城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千人之多。皇祐二年（1050 年），因范仲淹、余靖推薦於朝，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後又權同管勾太學。再如：杜子野在宜黃創辦鹿崗書院，為王安石少年讀書處，神宗熙寧六年（1073 年），朝廷授予杜子野「特奏名」進士。又如：曾鞏在臨川辦起了興魯書院，且親自製訂校規並任教，還聘請歐陽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以上三所書院，也都同屬於與朝廷較有關聯的書院。

---

[55]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airiti

2、家族文化式的書院：

五代以來，戰亂頻仍，相形之下，江西情勢安定，經濟文化穩定發展。北宋時期，集中在江西一帶的書院，如華林書院、雷塘書院、潯陽陳氏東佳書堂，則顯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時期的家族文化淵源。

（1）華林書院：位於江西奉新。起先是胡氏家族式學塾，發展為華林學舍。宋初，國子監主簿胡仲堯加以擴建，稱為華林書院。其宗旨是胡氏家族聚居，數代傳承經史、詩書、禮儀，並且累代博取功名。徐鉉〈華林胡氏書院記〉稱其：「祖孫一德，洙泗高風。」宋朝胡氏一家中進士者達 55 人之多，並有位至刺史、尚書、宰相的高位者。吸引許多各地學者前來，書院築室百區，藏書 5000 卷，肄業者數百人，辦學十分活躍。為華林書院題辭讚頌的王公巨卿有 72 人。[56]華林書院辦學的四大特色：1、是文學派的書院。2、是家族化的書院。3、重視女學，開了收納女生的先河。4、辦學經費全由家族承擔。[57]

（2）雷塘書院：洪氏世居於江西安義，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洪文撫於居處建雷塘書院，又名雷湖書院，以訓迪子弟，並招徠各處學者。以其南有雷塘，故名。

《宋史．孝義傳》記載：「文撫六世義居」，「就所居雷湖創書舍，招徠學者」。北宋至道年間，地方官將洪氏累世義居及創辦雷塘書院事蹟上報朝廷，宋太宗派內侍裴愈賜書百軸，文撫命有司修葺書堂以教子孫。之後洪文撫隨即派其弟洪文舉進京，進貢土特產以示答謝。宋太宗又親書一幅「義居人」賜給洪氏家族，任命洪文舉為江州助教。宋太宗又下詔，旌表洪氏門閭，並授以官資，免除洪氏徭役。自此以後，洪文撫每年都遣弟子入京進貢，宋太宗必賜答文。洪文撫侄洪待用，宋咸平年間進士，官至都官員外郎。宋楊億〈雷塘書院記〉：「處士之兄子待用舉進士得乙科，同時儕流登是選者以十數。初覆一簣，蓋由椎輪，後來之人貫魚而進。以錫羨流光之慶，加討論博習之資；圭組相輝，將珥貂于七葉；生徒益盛，必著錄者萬人，然後臻夫極

[56] 喬衛平：《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3-74。
[57] 百度百科：華林書院，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2 日，網址：https://reurl.cc/qva6WD。

airiti

也。」[58]這足以表明科舉對書院及讀書人影響之深。楊億又寫道：「先是潯陽陳氏有東佳書堂，豫章胡氏有華林書院，皆聚墳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為之記述。講道論義，況力敵以勢均，好事樂賢，復爭馳而並騖，宜乎與二家者鼎峙於江東矣！」[59]直至宋哲宗元祐間（1086-1094），文撫裔孫洪師民重建洪氏書院，更名「招賢」。其妻兄黃庭堅曾來此講學。

洪氏于宋初興旺一時，至北宋中期，又有師民父子 5 人，光照門戶。洪師民，博學多才，宋熙寧三年進士，曾任石州司法參軍。性至孝，其四子皆有才名。《豫章書》稱，宋豫章有四洪，朋、芻、炎、羽，皆黃山谷（庭堅）之甥也，皆能詩而位顯；鄱陽有三洪，適、邁、遵，皆洪忠宣之子也，皆能詩文而位顯。

（3）東佳書堂：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 年），義門陳氏始祖陳旺舉家遷至九江郡蒲塘場太平鄉（即今江西德安縣車橋鎮）東佳山下開創基業，創辦了培養陳氏子弟的家族私塾。陳崇於唐昭宗大順元年（890 年），將私塾發展成「東佳書堂」，屬義門陳氏家學，強調其為崇尚孝義的家族。因聲望日漸遠播，各地求學者慕名接踵而來，隨之擴大規模，改稱「東佳書院」，比「白鹿洞書院」還早五十年。徐鍇〈陳氏書堂記〉：

>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繫乎人者也。聖王之處士也就閒燕，孟母之訓子也擇鄰居。玄豹隱南山而成文章，成連適東海而移情性。此繫乎地者也。然則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
>
> 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書樓。……勛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揭之，旌其義也。袞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

[58] （宋）楊億：《武夷新集》（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收錄於《宋集珍臺叢刊》冊 2，頁 245。

[59] （宋）楊億：《武夷新集》（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收錄於《宋集珍臺叢刊》冊 2，頁 245。

airiti

> 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蛻、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60]

當時書院有房數十間，藏書數千卷，帖號「天下第一」(文德翼《求是堂集》)，成為宋初江南著名書院，博得宋太宗賜御書三十三卷和親題「真良家」的封號；義門陳氏是北宋中葉最大、最典型、極為罕見的家族組織機構。

3、地域文化式的書院

南宋時期的書院，根據《續文獻通考．學校考．書院》的統計，南宋新創的書院，約有 167 家，就其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其中包括許多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色，它們不拘氏族，各自傳承不同的理學大師的宗旨，或追念本鄉先賢名人而創建。前者追念理學大師如：周敦頤、二程、朱熹、呂祖謙、張栻、陸九淵、魏了翁、真德秀、楊簡等理學學者。後者所追念的文化名人，如文翁、韓愈、胡瑗、蘇軾、黃庭堅……等。

上述地域性的現象，同時反映在祭祀活動。宋代的中央官學及州縣學校多供奉先聖先師，或在德行、政績、學業的某一方面有可鑑於教化的先賢、官吏以及神靈等，奉祀對象不拘常格。至於書院方面，其祀典的供設，既有表明對至聖先師孔子、先賢或先輩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標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徵性作用，同時也是為了彰明本書院的初創者、辦學特色及其師門傳承的系譜。例如白鹿洞書院供祀李渤，石鼓書院供祀李寬，睢陽書院供奉戚同文等創發書院者。南宋書院，由於多來自理學家創建，故其祀典也多供奉北宋的周、張、二程諸子，以彰明尊崇道統的意涵。某一學派創辦的書院也往往供祀本學派的宗師，如象山書院奉祀陸九淵，杜淵書院祀楊簡；那些接受奉祀的理學宗師，由人而升格為神，並且顯然各自標識著學術專業傳承的地域性。

---

[60] （清）董誥等編，孫映逵等點校：《全唐文．卷 888》(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冊 6，頁 5469。

airiti

（八）、書院使綜合教育研究組織和學術中心已然成型

有關宋朝官學的教師，程運先生說：

> 宋代官學，一般視為冷官，且待遇菲薄，都不肯就，致濫竽充數。且科條繁密，動輒得咎，人事異動頻繁，……學事之廢弛，自為勢所必然的結果。[61]

書院教育相較於官學，在各個層面皆熱絡許多，上課方式可採師生共同研習討論的方式，也比較重視學術自由。這種相對自由開放的學制，學生可以不受一家一派之學的拘束，自由擇師，來去自如。因此，學生思路比較活躍，眼界也比較開闊，例如浙江奉化舒璘，少向張栻問學，後來追隨陸九淵、朱熹、呂祖謙求學，終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譽為「當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屬江西上饒）人汪應辰少從呂居仁讀書，之後拜胡安國、張栻、呂祖謙為師，求得「造道之言」，終成紹興五年（1135）殿試狀元。[62]南宋書院除了有著名學者主持，同時也是名師薈萃的學術中心，其教學水平高於一般官學，實質上有教學和研究相結合的功能。書院逐步發展成為綜合的教育研究組織，為一般僵化、窄化的官學所望塵莫及。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 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他還延聘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嶽麓，更加強了嶽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張栻主教期間，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培養出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秀學生。程運先生說：

> 當時之書院，則課程富彈性，能發明經旨，講學自由，重義利之辨，為學能窮理以致其知，反躬其踐其實。為師者人人能確指修養方法，以示學者。務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名聲名、取利祿。

---

[61] 程運：〈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政大學報》，第 21 期，頁 100。
[62] 喬衛平：《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9。

airiti

程運先生以為：重人倫之精神、重實踐之精神、重禮節之精神、重組織之精神、合作之精神等五項，是書院教育之特點[63]；這也是綜合的教育研究組織和學術中心所應呈現的特質，絕非侷促於爭取科舉功名的狹隘目標。李威熊先生說：

> 後人對書院制度雖有許多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它是融學術於生活最佳的教育方式，也培養出不少人格修養極高的大師。更為政府訓練政治人才，並對時政提供一些建言，及促進平民教育的普及，這些都是書院的正面作用。又它主要的教材是中國的經書，因此，書院對經籍的整理、研究和弘揚，都有相當大的貢獻。[64]

（九）、書院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交流

理學家們把書院作為傳播自己學說的重要基地，因此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各學派之間即使有互相辯難的情況，但其中不乏書院教師互相流動的現象，凡當世名儒、諸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可能應邀講學，且不受資歷、年齡的限制。

應天府書院的交流：北宋時期，晏殊[65]、孫復[66]、胡瑗[67]等不同學派的學者曾在應天府書院講學，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時而引起辯論，學術溝通的氣氛濃厚。

白鹿洞書院的交流：朱熹請南宋理學家另一派代表呂祖謙為修復工作寫記，交流學識，朱熹本人亦撰寫〈白鹿洞書院學規〉，並親臨講課，與學生質疑問難；1180 年農曆 3 月，書院得以完成重建。理學又一派代表人物陸九淵從金溪來訪白鹿洞書院，在朱熹的盛邀之下，登臺講學。陸九淵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令在場的學生和客人熱淚盈眶，在朱熹的要求下，陸九淵將這段演講內容寫下，之後刻在石碑上。朱熹在南康任職的兩年時間

---

63 程運：〈兩宋學術風氣之分析〉，《政大學報》21 期，頁 129 至 131。
64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頁 288。
65 仁宗天聖四年（1026 年），晏殊聘請范仲淹主持應天書院。
66 仁宗慶曆二年（1042 年），范仲淹、石介等推薦孫復前來書院講學。
67 仁宗景佑三年（1036 年），范仲淹引薦胡瑗赴開封，接受宋仁宗召見，且至書院講學。

airiti

內，是白鹿洞書院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翌年朱熹與陸象山共同講學，稱作「白鹿洞之會」，並奏請賜額及御書，書院名聲大振。[68]

嶽麓書院的交流：乾道三年（1167 年），朱熹到嶽麓書院訪問，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時人描繪「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所以不僅是長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書院因此成為不同學派理論的討論、爭鳴、交流的場所。這促進了理學的興旺及文化學術的繁榮。

石鼓書院的交流：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年），理學大師朱熹、張栻來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張栻在合江亭中立碑，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 年），石鼓書院改為衡州路的官學。

文宗書院的交流：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會講於上饒鉛山縣鵝湖鎮鵝湖山麓之鵝湖寺，他們各持己見，「相與講其所聞之學」，此一學術上的著名交流，就是的「鵝湖之會」。宋淳祐十年（1250），改「鵝湖寺」為「文宗書院」。明代景泰年間（1450—1456），又重修擴建，並正式定名「鵝湖書院」。[69]

由以上諸例，可知宋朝書院不僅各自樹立學術特色，對於推行學術交流也非常用心，中華學術進化因此得以大幅向前邁進。

參、結論

一、官方與書院各取所需，互助互利，相輔相成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書院由於官方的關照，故依

[68] 維基百科：白鹿洞書院，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3 日，網址：https://reurl.cc/ZV8vLV。

[69] 百度百科：鵝湖書院，查詢日期：2024 年 3 月 28 日，網址：https://reurl.cc/bYeArr。

airiti

附於科舉制度並且得以暫代官學的角色，例如睢陽書院的教育工作為國家培育官職人才做出莫大的貢獻。尤其是緩解朝廷尚文治而疏於培植根本，且「重選而不重教」的弊病。

衡陽石鼓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是元朝馬端臨所提出的北宋四大書院。它們屢獲朝廷或官方賞賜，包括物質賞賜，或封賞職位；以致某些原本私人所創書院，發展到人氣正旺時，政府可能適時將它「收編」，改私立為公立；這是朝廷在教育機構方面獲取不小的現成果實。

北宋有五大理學家，大多擔任官職，在學術上發揮不小的影響力。南宋時期，朱熹是理學的領航者，書院是理學家們推展教育的主要場所，此時期，除了胡宏以講學為務，力辭朝廷官職之外，如：陸九淵、陳亮、葉適、呂祖謙、真德秀、魏了翁、張栻等各派理學代表學者，除了努力為時代和社會建構學術理論，同時整理、研究和弘揚傳統經學之外，也都曾擔任官職。足見書院理學家們與朝廷官職體制之間實有難以切割的牽繫，雙方關係可謂互利互助，相得益彰。

二、私立學術機構健全發展，已能獨當一面

就經營方式和實際表現而言，北宋民間書院不待官方的規劃或指導，已然發展順遂；加上德業與功名兼顧的講授內容，在在使私立書院教育堪稱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而且其輝煌成績勝過官辦太學。

南宋初年，如國子監、州縣學等官學都得到設立，但學子心中在意的，是科舉功名，無心進修，以致學校淪為有名無實的教育機構。反觀南宋書院，其提倡高風亮節，不仰慕功名利祿，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梗精神，專業於學術，推崇修己至誠之道，與腐敗的官學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例如前有張栻主教嶽麓，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後有朱熹請求修復已廢馳百餘年的白鹿洞書院，這是南宋書院大興的起點。從此，南宋的書院教育普遍風行，至於理宗朝（1205－1264）書院發展到極盛。

airiti

書院教育相較於官學，在各個層面皆熱絡許多，上課方式可採師生共同研習討論的方式，也比較重視學術自由。這種相對自由開放的學制，學生可以不受一家一派之學的拘束，自由擇師，來去自如。因此，學生思路比較活躍，眼界也比較開闊。南宋書院除了有著名學者主持，同時也是名師薈萃的學術中心，其教學水平高於一般官學，已充分具備教學和研究相結合的功能，成為綜合的教育研究組織，此為一般僵化、窄化的官學所望塵莫及。

程運先生以為：重人倫之精神、重實踐之精神、重禮節之精神、重組織之精神、合作之精神等五項，是書院教育之特點；這也是綜合的教育研究組織和學術中心所應呈現的特質，絕非侷促於爭取科舉功名的狹隘目標。

三、不同屬性的書院分頭發展，皆與官方相關聯

（一）就學術派別而言，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 年－1067 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理學家則有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北宋五子」。理學發展到南宋朱熹時期，已形成著名的濂、洛、關、閩四學派。以上諸家對於兩宋學術思想及官場育才都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南宋的儒學分為三派——胡五峰之「湖湘之學」源自程顥；朱子之學，源自程頤；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

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 年）、淳熙（1174－1189 年）年間，理學大盛，理學家們四處創建、主持書院，傳播個人學術思想。除了朱熹（閩學）、陸九淵（心學）之外，又有陳亮（永康之學）、葉適（永嘉之學）、呂祖謙（婺學）、真德秀（西山真氏學）、魏了翁（蜀學）、胡宏（湖湘學之開創者）、張栻（湖湘學之集大成者）等著名理學家為代表人物。他們宣揚學術理論，足以顯示書院各具特色及辦學績效。也因為以上名師大多出任官職，因此，各學派幾乎與官場育材、選材方面有著莫大的關連。

（二）就學院的屬性而言，宋朝書院可歸納為三類不同的屬性：朝廷關聯式、家族文化式、地域文化式等三種書院。

1、朝廷關聯式書院，如：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以及李覯創盱江書

airiti

院，杜子野創鹿崗書院，曾鞏創興魯書院，都屬於與朝廷關聯較大的書院。就為國育材、選材的功能而言，其辦學目標做了明顯的配合。

2、家族文化式書院，如胡氏家族所建華林書院、洪氏家族所建雷塘書院，義門陳氏所建東佳書堂，都是同族聚居，顯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時期的家族文化淵源。他們數代傳承經史、詩書、禮儀，其發展興盛於宋朝，同時也招收家族以外的學生，無論是講學內容，教忠教孝，淳化社會風氣，且累代成功地博取功名，與官方保持不可忽視的關聯。

3、地域文化式的書院，例如南宋新創的大約 167 家書院，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使它們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色，它們不拘氏族，各自傳承不同理學大師的宗旨，或追念本鄉先賢名人而創建，有些為了彰明本書院的初創者，例如白鹿洞書院供祀李渤，石鼓書院供祀李寬，睢陽書院供奉戚同文等創發書院之人。

以上無論其書院屬於哪個學術流派，或是它們的創立屬於哪一種屬性，當他們藉由書院傳授學術，推展教育的同時，除了強化道學的傳承、人格的陶冶之外，幾乎也都非常在意讓學子或家族成員參與朝廷的科舉考試，鼓勵他們出任官職，報效國家。這也明顯反映書院在力圖發展的同時，十分在意其與朝廷深刻的依存度和互動關係。

四、教育內容有助於提升人民素質，淳化社會

唐朝唐昭宗大順元年（890 年）陳崇所創立的「東佳書堂」(後擴建更名為東佳書院)，當時即已寫下〈義門家法三十三條〉。北宋初年，胡瑗、孫復、石介、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自覺地肩負重建傳統中華文化、復興聖賢學說的使命，遙接三代之「道」，求「生民建教之本」，以及「救斯文之薄」，打算將儒家文化精神重新貫注到政治、社會、學術、人心之中;「創通經義」、「革新政令」，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

天聖五年（1027 年)，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課程和管理規則。范仲淹平日勤勉督學、以身作則，當時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可謂來自范仲淹的倡導，樹立了煥然一新的學

airiti

風。其〈南京書院題名記〉記載此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

北宋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重要主張。這幾句話引發當時理學家們的共鳴，當他們為中國文化重寫新頁時，不但關注國家政治的現實層面，更要超越此一層面，為萬千生民及後代子孫建立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生命哲學，讓天道的運行、宇宙的存在都是生生不已的至善之流，是剛健不息的實理大道。

南宋朱熹曾為白鹿洞書院制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以及〈白鹿洞書院教條〉，對於當時及後來的教育界產生莫大影響。他強調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五倫相處之道，其次是明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為學次第；再次則是教導學生修身、處事、接物的要領。朱子已然規定了書院教育的宗旨、內容和方式，條列具體而涵意精微，成為其後歷代書院制度模擬的範本。此外，朱嘉為石鼓書院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

宋朝書院的教育，是要培養頂天立地，堂堂有為的君子，為國家，為社會，為後代子孫謀劃長長久久的幸福。因此，在為學術耕耘，為社會奉獻潛移默化的心力時，書院教育具備：提升人民素質、淳化社會風俗的功效；這可視為民間書院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為官方默默地做了很多事，可謂厥功甚偉。

五、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促進熱絡的溝通交流

理學家們把書院作為傳播自己學說的重要基地，因此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各學派之間即使有互相辯難的情況，但其中不乏書院教師互相流動的現象，凡當世名儒、諸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可能應邀講學，且不受資歷、年齡的限制。

應天府書院方面，北宋時期，晏殊、孫復、胡瑗等不同學派的學者曾在

airiti

應天府書院講學，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時而引起辯論，學術溝通的氣氛十分濃厚。白鹿洞書院方面，朱熹與另一學術流派代表呂祖謙之間有所交流，朱熹本人亦撰寫〈白鹿洞書院學規〉，並親臨講課，與學生質疑問難。不同流派的理學家陸九淵從金溪來訪白鹿洞書院，在朱熹的盛邀之下，登臺講學。也舉辦了學界津津樂道的「白鹿洞之會」。嶽麓書院方面，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到嶽麓書院訪問，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石鼓書院方面，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理學大師朱熹、張栻來此講學。文宗書院方面：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舉行學術上著名的交流，此即「鵝湖之會」。

由以上諸例，可知宋朝學者不僅各自樹立學術特色，對於推行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也非常用心。而書院正好成為不同學派理論的討論、爭鳴、交流的場所。這促進了理學廣泛流佈，也使中華學術的進化得以大幅向前邁進。

airiti

參考文獻

一、史料 Primary sources

（宋）楊億 Yang Yi
《武夷新集》，收錄於《宋集珍臺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
Wuyi xin ji (Beijing: Wire Bound Bookstore, 2004)

（宋）范仲淹 Fan Zhongyan
《范文正公集》，收錄於《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Fanwenzhenggong j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宋）范仲淹 Fan Zhongyan
《范文正公集》，收錄於《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 年）
Fanwenzhenggong ji (Beijing: Wire Bound Bookstore, 2004)

（宋）朱熹 Zhu Xi
《朱文公文集》（內頁題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錄於《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Zhuwengong wenj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宋）呂祖謙 Lu Zuqian
《呂東萊先生文集》（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1970 年）
Ludonglai xiansheng wenji (New Taipei City Banqiao: Yee Wen Publishing, 1970)

（元）馬端臨 Ma Duanlin
《文獻通考》，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Wenxiantongkao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元）脫脫 Tuo Tuo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
Songshi (Taipei: Ting wen)

（明）陳邦瞻 Chen Bangzhan
《宋史紀事本末》，收錄於中華書局編輯部：《歷代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Songshi jishi benm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airiti

（清）袁枚 Yuan Mei
《隨園隨筆》（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Sui yuan sui bi (Taipei: Ting wen, 1978)

二、論著 Secondary sources

蔡仁厚 Cai Renhou
《宋明理學・北宋篇》：心體與性體義旨述引（臺北：臺灣學生，1982 年）
"Songminglixue・Beisongpian": xinti yu xingti yizhi shuyin (Taipei: Student Book, 1982)

蔡仁厚 Cai Renhou
《宋明理學・南宋篇》：心體與性體義旨述引（臺北：臺灣學生，1983 年）
"Songminglixue・Beisongpian": xinti yu xingti yizhi shuyin (Taipei: Student Book, 1983)

王明蓀 Wang Mingsun
《宋遼金元史》（臺北市：眾文出版，1986 年）
Song liao jin yuan shi (Taipei: jwbooks, 1986)

李威熊 Li Weixiong
《中國經學發展史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Zhongguo jingxue fazhanshi lun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8)

孫培青 Sun Peiqing
《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Zhongguo jiaoyushi (Shanghai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2)

傅樂成 Fu Lecheng
《中國通史》（臺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1993 年）
Zhongguo tongshi (Taipei: Da Zhong Guo books Co, 1993)

喬衛平 Qiao Weiping
《中國遼金夏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Zhongguo liao jin xia jiaoyush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古清美 Gu Qingmei
《宋明理學概述》（臺北市：臺灣書店，1996 年）
Songminglixue gaishu (Taipei: Taiwan Book Store, 1996)

程光裕、王吉林 Cheng Guangyu、Wang Jilin
《中國通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4 年）
Zhongguo tongshi (Taipei: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 2004)

airiti

余英時 Yu Yingshi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市：允晨文化，2004 年）

Songminglixue yu zhengzhiwenhua (Taipei: Asanculture, 2004)

苗書梅等點校 Miao Shumei et al.

《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

Songhuiyao jigao・Chongru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陳雯怡 Chen Wenyi

《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You guanxue dao shuyuan: cong zhidu yu linian de hudong kan songdai jiaoyu de yanbian (Taipei: Linking, 2004)

戴逸、龔書鐸主編 Dai Yi、Gong Shuduo

《中國通史》（臺北縣，中和：中國經濟通訊社，2005 年）

Zhongguo tongshi (New Taipei City, Zhonghe: China Economic News Service 2005)

李兵 Li Bing

《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Shuyuan yu keju guanxi yanjiu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季嘯風 Ji Xiaofeng

《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Zhongguo shuyuan cidian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6)

李才棟 Li Caidong

〈書院的起源與宋代書院的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3 期。

"Shuyuan de qiyuan yu songdai shuyuan de fazhan",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3 (1985)

程運 Cheng Yun

〈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政大學報》21 期，1971 年。

"Liangsong xuexiao zhidu zhi fenxi", *Journal of Nationalis Chengchi Universitas*, no.21 (1971)

程運 Cheng Yun

〈兩宋學術風氣之分析〉，《政大學報》21 期，1971 年。

"Liangsong xueshu fengqi zhi fenxi", *Journal of Nationalis Chengchi Universitas*, no.21 (1971)

airiti

羅智韋 Luo Zhiwei

〈救斯文之薄：論北宋初年書院的教育目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第 14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

“Jiu siwen zhi bao: lun beisong chunian shuyuan de jiaoyu mud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edagogy*, vol.14, no.2 (Jun.2020)

三、**網路資源** intemet resources

教育雲：教育大市集 Jiaoyuyun: Jiaoyudashiji

許家銘：〈南宋書院的興盛與理學的發展〉，https://reurl.cc/2j7V24（查詢日期 2024 年 3 月 24 日）

Xu Jiaming “Nansong shuyuan de xingsheng yu lixue de fazhan”, https://reurl.cc/2j7V24 (Retrieved on March 24, 2024)

百度百科 Baidu Baike

鵝湖書院，https://reurl.cc/bYeArr（查詢日期 2024 年 3 月 28 日）

Ehu Shuyuan，https://reurl.cc/bYeArr (Retrieved on March 28, 2024)

百度百科 Baidu Baike

華林書院，https://reurl.cc/qva6WD（查詢日期 2024 年 4 月 3 日）

Hualin Xueyuan，https://reurl.cc/qva6WD (Retrieved on April 3, 2024)

中文百科 Zhongwen Baike

東佳書院，https://reurl.cc/adEAKG（查詢日期 2024 年 4 月 10 日）

Dongjia Shuyuan，https://reurl.cc/adEAKG (Retrieved on April 10, 2024)

維基百科 Wikipedia

白鹿洞書院，https://reurl.cc/ZV8vLV（查詢日期 2024 年 3 月 23 日）

Bailudong Shuyuan，https://reurl.cc/ZV8vLV (Retrieved on March 23, 2024)

Tripadvisor 貓途鷹

白鹿洞書院教條，https://reurl.cc/1blqNp（查詢日期 2024 年 3 月 20 日）

Bailudong Shuyuan Jiaotiao，https://reurl.cc/1blqNp (Retrieved on March 23, 2024)